

編後語

SARS疫情向世界蔓延，再次暴露出大陸傳媒體制的弊端，而本期「傳媒與公共領域」討論中國傳媒改革問題的四篇文章，也就顯得非常適時了。1990年代以來，大陸、香港和台灣發生了不同形式的社會及政治轉型，李金銓用自由多元主義和激進馬克思主義兩種傳媒政治經濟學，比較三地的傳媒變化和生存策略，清理「語境錯置」的謬誤；給出一幅傳媒與政治變革的交光互影動態圖畫。陸曄則從當前大陸的宣傳管理、新聞判斷和消息來源三個微觀層次，分析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實踐形態和發展趨向。儘管西方學界早已深刻反省傳媒商業化的種種流弊，但麥康勉認為在中國國情下，商業化所促成的媒體多元化以及國際化等趨勢，對塑造公共領域正在發揮積極作用。吳非一文是研究從葉利欽到普京時代，俄羅斯政府對媒體的政策和控制的變化及互動，為中國傳媒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照。

本期「百年中國與世界」三篇論文，分別以關鍵詞研究的方式，探討了「民族」、「階級」和「階級鬥爭」這三個支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生活的最重要觀念。王柯細緻梳理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“Nation”這一概念從歐洲經由日本引入中國的「跨國傳播」歷史。他指出，中國在接受日製漢詞「民族」時，對日本文化和歷史所賦予該詞的片面強調「單一民族、單一主權國家」的內涵未有警覺，從而為追求建立「民族國家」的二十世紀中國留下無窮後患。黃冬姬則考察了1927年之前「階級」概念在中國知識界的引入與激進化的歷史；錢鋼以全文檢索為工具，使用計量與歷史事件結合的方法，分析1956-69年間從中共八大到文革高潮時期，「階級鬥爭」一詞在《解放軍報》上的使用頻度變化，這種變化和黨內路線鬥爭、政治運動的關係，以及這一詞彙的強勢傳播過程。今年4月李慎之先生在北京病逝，本刊以特稿方式邀請資中筠、袁偉時和朱學勤撰稿，紀念與緬懷慎之先生，探討他對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建設的思想貢獻與精神遺產。

古今中外，瘟疫和戰爭都代表着衝擊人類生活秩序的兩種自然和政治力量。林國華解讀西底德的史學經典，重現兩千多年前波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大瘟疫的恐怖和慘況，以及在瘟疫和戰爭中希臘哲人對制度和人的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思考。傅懷鋒考察了1910年在上海公共租界爆發的、引起民眾恐慌的鼠疫風潮，分析中西兩種制度和文化在疫情危機中的互動與社會秩序重建過程。此外，崔衛平描繪出當代大陸獨立製作人如何艱辛地開拓民間影像運動，紀錄社會底層生活實況。而文潔華則解讀香港著名攝影家梁家泰的作品，揭示了香港無數「匿名英雄」以沉默而尊嚴的態度面對現代都市的困擾，打造了根植於民間的「香港精神」。正因為有這種成熟的市民力量和專業精神，在SARS襲港時，才能展現出香港都市的臨危不懼、奉獻社會的精神品格。由春至夏，瘟疫瀰漫又似乎將消弭，這也許正是中國人反省自身的最佳時期。瘟疫中，最能見到人性中、自身文化以及制度中最弱、最醜陋以及最值得珍惜的東西。